

人体摄影

王小慧

“阴与阳”、“部分被解放的女人”等摄影作品系列是我最早拍的人体作品,那是在 1990 年,我刚去欧洲三四年的时候。在这之前,人体摄影对我和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禁区,我从未接触过,甚至想都没想过。我也很少看到人体,甚至在学习素描的时候,我们的习作只是画石膏像。我在德国大学里做助教的时候,常常在附近的古希腊艺术博物馆里带学生一起画那些古希腊人体雕像素描,虽然觉得很美,但也从来没有把它们和真的人体联系到一起。

我拍人体的契机是一本杂志的约稿,这个杂志叫“HQ”(“High Quality”即“高品质”的缩写),它是一个设计与艺术杂志,每一期会邀请一些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就一个主题自由创作。我那一期的题目是“左与右”,当时邀请了一位设计家、一位画家、一位雕塑家和我四个人就这个主题来创作。看到这个题目,第一反应是想到了中国“男左女右”这个说法。

后来我发现,这个说法是和道家学说有关的。我突然发其想:为什么不能用人体摄影来表现这个主题呢?于是我找了黑人女模特和白人男模特来共同创作这一组“阴与阳”的人体摄影系列。

第一次拍摄的时候,是在一个空旷的剧院舞台上,当时是深秋天气,很凉。我请的四个模特大大方方地站在舞台中央,等候我的摆布,台下有一位朋友在控制灯光,他们不断地问我好了没有。可是我的心理准备还不足,所以我迟迟没有让那个朋友打开大灯。对我来说,那绝对是一次文化冲击,模特没有不好意思,反而是我不好意思了。

我在德国拍摄的所有人体模特,不管是在电影中还是在摄影作品中,都是自愿的、免费的,其中有专业模特,有业余模特,也有戏剧或者影视的演员,还有很普通的人。其中只有一个例外,那是唯一的一位中国人,也是我唯一付过费用的模特儿。

我拍摄的人体不是为表现女人的性感,而是表达许多观念。没有服装的人体比较单纯,没有给被摄者任何社会的附加含义,可以更纯粹、更直接地表达主题。

东西方对人体有很不同的态度。在中国,人体好像总是要遮遮掩掩。在欧洲,大家都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态度去对待人体,不少人崇尚一种所谓“天体文化”。比如在我居住的城市慕尼黑,是巴伐利亚的州府,巴伐利亚州在德国被认为是比较保守的地区,居然在市中心的英国公园,每年夏天都会有很多人在天气好的时候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晒太阳。在这些 people 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美有丑,有胖有瘦,他们没有人会觉得自己的体型不够标准不够漂亮而感到难为情,他们会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反而我这个中国留学生,在刚去德国的那几年,夏天天气好的时候会舍近求远,不穿过英国公园,而绕很远的路回家,因为我会觉得走过这些人群自己不好意思。

作为一个女性摄影家,一个在西方人眼里很有异国情调的女性艺术家,很多年来经常有人会问我,为什么不拍自拍的人体作品,因为我当年的“自拍像”已经有点名气了。有不少朋友善意地劝我,说你现在不拍,将来会后悔的,人总会老去。他们觉得,如果我拍自拍人体创作,会是在艺术上有很大的突破,而且有著名出版社愿意为我出版画册,也有美术馆愿为此办展。犹豫了很久我仍没有做这件事,或者说即使我拍也绝对不会去发表,因为毕竟我是一个中国女性,头脑中还有很多非常传统的观念,虽然我是一个当代艺术家,又在西方生活了多年。作为艺术家拍自拍人体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我仍然不能突破这一关。这是在我身上传统与现代、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矛盾。所以我说我自己也是个“部分被解放的女人”。

每周五天班,单位食堂准备了五种汤,给我们轮换着吃,美其名曰“均衡膳食,营养搭配”。哪五种呢?一是紫菜蛋汤,二是番茄蛋汤,三是冬瓜海带汤,四是萝卜豆腐汤,五是大白菜汤。五种汤,光看菜谱,也就大白菜汤推板(次)了点儿,其余几个不都很好嘛。但是,这汤放在饭厅里,一大桶,热气冒冒的,却一点儿香味也飘不出来。有同事来吃饭,刚进门就情不自禁地捂着鼻子说:“饭虽然热气腾腾,但没闻着菜香,只有一股股的油腥味绕梁久久。”油韵味就油韵味吧,凑合吃吃得,走!去捞捞点儿汤“料”尝尝,今天恰逢冬瓜海带汤,汤勺被一个同事握着,好吧,让她打打。

同事屏息凝神,身子一动不动,手上的沉重勺子端着特别稳,这架势,似乎不是捞汤“料”,而是在水里逮鱼。只见她动作稳准狠,而且还分了几个步骤,先来个海底捞月,用勺子潜入桶底搅得风生水起——其实每一片冬瓜都被厨子香汗淋

近来,在江西一些中小城市里悄然兴起了一个新行当,一些农科毕业的大学生创办了上门帮“种”菜的服务公司,他们根据户主的需求,设计户内的阳台、平台、走廊、过道种菜,并提供技术、种子、肥料、容器,“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全包,平时随叫随到,“秋后算账”,全年服务费一般不超过100元。很受居民欢迎。

上门帮“种”菜

袁晓赫

我喜欢种菜,年头报了名,公司设计我家阳台上有吊着种的,架着种的;客厅有摆着种的,过道上靠墙挂着种的等四十多个盆,其中有土壤栽培的,有营养液栽培的,种子、营养土、营养液、肥料、容器共花了50元,前后种了八个品种,公司来指导了四次。一年四季,长出的新鲜蔬菜辣椒黄瓜苦瓜豆角空心菜等根本吃不完,每天望着水淋淋、绿油油的劳动果实,心里别说有多舒畅了。真感谢上门帮“种”菜的年轻人!



第一次听说这种鸟,是在中学时读到的夏目漱石的一则短篇里,彼时,我还没有亲眼见过这鸟的模样,但是夏目漱石把它写得美极了,我读完就恨不得立刻买一只。可惜,当我把这个念头告诉母亲之后,得到了她的否决。

大学毕业之后,我从宿舍搬进了租的房子。等一切收拾停当,我心里竟然又生起了养文鸟的念头。于是,初秋的时候,一对文鸟被我带回了小屋。

“在细长而呈淡红色的脚的尖端,镶着晶莹如珍珠的爪子……眼睛是乌黑乌黑的,眼睑的周围像是镶嵌着细细的、粉红色的丝线。”只有亲眼瞧着这对美丽的生物,才能体会到夏目漱石的笔触是多么的细腻和传神。我把鸟笼放在书桌旁,阳光好的时候,它们常常在竹杠上面跳来跳去,并发出清脆的“啾啾”声,雪白的身体配上轻盈的姿态,十分美妙。到了傍晚,它们就回到草编的窝里,簇拥在一起,静静地等待入眠。一天晚上,我开着电视,正在浴室洗漱,突然听到里面的房间传来了文鸟鸣叫声,我赶紧过去查看,原来两只文鸟被电视所吸引,从窝里出来了,它们好奇地张望着,还随着电视里的音乐一起啼啭。

就像夏目漱石所写的那样,文鸟很爱洗澡。有一次,我试着把盛满清水的小碗放到笼内,没想到我的手刚刚收回去,它们就

迫不及待地跳入水里,扑腾起来,一时间水花四溅,我赶紧用布把四周擦干,两个小家伙却洗得很起劲。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文鸟

寇曼璇

了,文鸟与我也渐渐熟悉起来,换食的时候,它们不再会惊讶得四处乱飞,而是惬意地站在竹杠上等待着。我很高兴,心想也许用不了多久,它们就能飞到我手上吃食了……就这样期盼着的时候,我却生病了,得离开这里一段时间,于是文鸟只好拜托给房东喂养,草草交代了几句注意事项之后,我就离开了。就这样,两三周过去了,我突然想到了文鸟,心里感到很不安,赶紧给房东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电话那边传来的竟是噩耗,房东解释说,一直按照我说的方式喂食着,但其中一只突然就死去了。

等我再次回到小屋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笼里的文鸟只剩下一只,整日无精打采地待在窝里,很少啼啭了。听说,文鸟失去同伴以后,便无法活得很久,看着它寂寞伶仃

的样子,我心里很懊悔。我又去了卖鸟的地方,打算给它找个新同伴,但是卖鸟人告诉我,文鸟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有。无奈之下,我在鸟笼里装了一



面镜子,希望能消解它的寂寞。没想到,这个方法竟然奏效了。文鸟把镜中的影像当做了自己的同伴,它常常跳到镜子前面啼叫着,并时常用喙轻轻敲击着镜面,仿佛在与镜

中鸟互动,就连进食的时候也要站在镜子前面,与镜中鸟一起吃。看到它又恢复了生机,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慢慢地,文鸟和我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一次,我洗好手还未擦拭,正要把小碗拿出去添食,文鸟突然跳到了我手边,轻轻在我手上啄着,我愣住了,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它是在喝我手上的水。虽然这种交流的方式很奇特,但我开心极了,因为不知不觉间,我和文鸟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美妙的联系。

道了,因为渡船走了很久以后,我没看到前面有小火轮。

我回家乡坐的渡船沿西江开到高明县,称为高明渡。途经我家乡鹤山县古劳,我就在那里下船。在路上要经过一个险滩,甘竹滩。到了那里,船上工作人员就烧纸箔,祈求平安。甘竹是我们广东一个有名地方,生产甘竹辣椒酱。广东人基本上不吃辣,所以这辣椒酱与四川的不同,颜色鲜红,有辣味,但不太辣。大家到广东馆子,一上来必给你提供一碟这种辣椒酱和一碟芥菜,别忘了,要收钱的。记得我曾闹过一次笑话。上海解放初期,规定吃满多少钱要付一种税。有一天我一家人到新雅饭店吃饭,我妻子算好了菜多少钱,饭多少

钱,算得清清楚楚,没有超过限定的款额,可就是忘掉了这两碟小玩意儿,结果要付税,当时我经济不好,为之懊恼不已。

渡船晚上七点多钟起航,第二天早晨五六点钟到鹤山古劳,停在码头前面的江上,我们坐小艇离开渡船到码头上岸,然后走上四五个小时回到家乡旺宅村。反过来,回广州时半夜出发离开村子,早晨在古劳上渡船,下午回到广州。所以过去来回家乡是件大事,如今竟是坐几个钟头长途汽车的小事,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伦敦街头(水彩画)

荣德芳



我高位截瘫,须臾离不开轮椅。前些日子,我接到市肢残人协会“中途之家”的会议通知,叫我去开会。开会的地方离我家很远,过去可以叫区残联派车,现在不行了。听说,“阳光车队”还有一辆车在运行,我便按老规矩,提前5天打电话到车队去预约,车队说,已经预订满了,打我的回票。大约2013年5月,昔日深受重度肢体残疾人以及数量不断增加的老年人欢迎的“阳光车队”解散后,大家就一直迫切希望有一种新的交通工具能替代“阳光城市”。在焦急的等待中,2014年10月,人们等来了英伦多功能出租车。首先在电视上看到“英伦车”,车子卖相很好,说是还有一个叫法,叫“老爷车”。大家都期待着乘“老爷车”。

我决定预约“英伦车”。为了保险起见,我提前3天打电话预约,接电话的话务员小姐说我预约早了,他们公司只接受提前一天预约。开会前一天,生怕订不到,一大早,我就打电话预约,话务员小姐说没车,班次已经订完了。听着话务员小姐的回复,我有点傻掉了。提前3天预约,说是不符合他们公司的规定;按规定提前一天预约,一大早就没车了,这是怎么一回

事?我又分别给大众和强生出租车公司预约出租车,服务台小姐告诉我,高峰期间,每天上午7点到9点,公司不预约出租车。没法,我只得自己用别的方法赶过去。有两个方案:一、沿途拦得到出租车,就打的过去。二、拦不到出租车,就乘地铁去。既然是两个方案,就只能做好两手准备。一、可能要乘地铁,就

“老爷车”不老爷

连俊

必须提前两个半小时出门。二、可能要拉差头,就必须叫上“阿姨”一起去,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是没法乘差头的。这样,就造成两个后果。一、如果拉到差头,我就提早一个小时到会场,很傻的。二、如果乘地铁,我需多付一个人的车费。沿途见到几辆空驶的出租车,但扬招都不睬。没办法,一行三人只好走走停停,朝地铁车站方向走去。从我家去乘地铁,必须过一座桥,桥很陡,推轮椅过桥很吃力。于是,妻子在我的轮椅上绑一根绳子,她像纤夫一样在前面拉,阿姨在后面推,看上去很浪漫,其实很吃力,最后到了地铁车站,也没有拦到差头,只好进站乘地铁了,一群健全人与

我争抢乘无障碍电梯。

开好会,领导给我订了一辆“英伦车”,当车子迎面开过来时,我很高兴,车子确实很漂亮,别有风味,坐在里面会觉得很得意的。但当司机从车厢地板内抽出折叠式铁板斜坡叫我上车时,我惊呆了。斜坡又短又窄,如果旁边没有人保护、帮忙,坐轮椅的残疾人是根本不可能自己一个人进去的。我是在阿姨和司机合力保护下,才把轮椅车推进去的。车厢里面也很狭窄,轮椅车只能嵌在两排座位中间,没有左右移动的余地,没有固定轮椅车的装置,坐在那里,提心吊胆,更没有原地调头的空间,所以下车再沿着那条又短又窄的坡道必须倒车下去,更危险。虹口区“中途之家”伤友组长傅小敏女士乘车后表示,今后没人陪同不愿再坐。我也有同感。所以我说“英伦车”不老爷。

十日谈

我乘出租车

他们是一线党员,每天做的都是平凡普通、服务身边群众的工作。但正是这些貌似不起眼的工作,把党心民心连在了一起。明起刊登截取于上海基层党建网的一组《基层日志连连看》。

